

革命历史小说的难度与新意

——关于陶纯小说近作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柳建伟：陶纯近年来的军旅小说创作风头正劲，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屡有佳作问世。尤其是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探索和挖掘，用力颇深，视角独特，质量上乘。阅读陶纯的小说尤其是军旅小说，总会有意外的收获。我想，这和作者对小说难度的自觉追求相关，也就是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制造难度，进而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圆满地化解这种难度。长篇小说《浪漫沧桑》如此，收入到小说集《前程似锦》（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里的中篇小说《七姑八姨》《根》《过来》等新作，亦是如此。

《过来》对革命家庭的婚恋问题，开掘得新颖而精彩。作家着力表现男女主人公善良的天性，故事越到后面越温润，人性的升华也在情理之中。当我读到女主人公去世前终究没有将那双千层底布鞋送出去的段落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根》写长征中一个女红军重伤员，在队伍转移后历经波折而奇迹生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想要讲好难度很大。作者依靠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很好地完成了它。作品着重表现中华民族植根于骨子云的良善品行，读来感人肺腑、回肠荡气。

《七姑八姨》以“拉家常”一般的叙事方式，借一位党史工作者“我”之口，讲述了四川大巴山区的4位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庞壮英、苏三妹、罗秀娥、何四姑这4个人物，个个塑造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她们的牺牲和奉献令人震撼、感动之余，触动人的思考。在正史讲述和英雄谱中，没有她们的名字，但她们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值得书写。时间的尘埃有时会遮蔽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者的责任就是拨开云翳，扫去尘埃，发掘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并且严肃而深刻地塑造他们。

笔墨的“平常化”，是陶纯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技巧的更高境界是化技巧于无形。作品的自然化、平常化其实是很难的。有些写作者刻意回避小说的难度，不去制造难度，更无力化解难度；致力于避免

就虚，玩弄技巧的花招，哗众取宠，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无法取得更高的成就。陶纯选择的是迎难而上，他以往的作品如此，这几部作品亦是如此。不管是叙述，还是描写，没一处故弄玄虚，没一句“花红柳绿”；看上去平淡无奇，老实巴交，实则大巧若拙，深藏不露；引领和感染在不知不觉间，思想的灌注也在不知不觉间。

小说集《前程似锦》里的几部作品给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更为要紧；对小说难度的自觉追求非常重要，它考验着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关系着一部作品的成败。像陶纯这样，最大化地制造难度，最理想化地解决掉这种难度，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有分量，体现出思想的穿透力和创造性的美感。这也是陶纯的创作路径对于年轻写作者的一点提示。

综观近年来陶纯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没有重复写那些看似“老套”的革命历史故事，而是试图从历史的缝隙中有新的发现。他着力寻找“好看而有趣味”的故事，在历史的角落里探寻并塑造出一个个闪烁着人性之光的新鲜人物，给军旅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新的、具有范式价值的人物形象。陶纯笔下的这类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传奇的命运遭际，在陶纯的小说中复现，令人感喟。如今的读者经由小说回望革命历史，目光中若能多一份对英雄和崇高的眷恋与敬意，这便是军旅文学的价值所在，也是军旅作家的责任所系。

余晖：《陶纯中篇小说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11月）收录了陶纯近几年的主要小说作品。阅读之后我发现，他自觉按弃了叙事视角的复杂和手法的炫技，让人物快速入场，力求使主要人物快速地鲜活、立体起来。这是作家对小说人物主体性认识的高度自觉，体现出他的艺术追求。正如陶纯在这本小说集的代序中所说的：“好的小说，必然由于里面有生动而鲜活的人物，否则很难成为好小说。所以，塑造人物是小说之本，小说生来为人物。如果你写的人物有一个被人记住，你就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在我看来，陶纯的努力与尝试是成功的。如果把小说集子里的5个故事中的5位主人公，放置在同一个场域里进行审视

的话，他们斑斓的人生际遇颇具典型性。写出人物个性的同时，流露出作家对人的处境及命运的深刻关怀，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承袭。

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掌握创作的“基本盘”之外，还要尽可能地拓展题材，不断地挑战自我。这里，我想再次提及人物——塑造被读者难以忘记的人物是这部集子传递出来的强烈信号，也是作家的不懈追求。作家擅长将人物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展开与人物的对话，通过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中的一言一行，反观自身，达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中篇小说《平平的世界》借一只宠物犬“平平”的视角，讲述了“那家、那人、那狗”的日常伦理和火热生活。“平平”不仅是主人的生活陪伴，也是人类反观自我的透视镜，这是陶纯借助动物视角展开叙事的深度所在。中篇小说《王凯的故事》从多个视角讲述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凸显了作家心理探究和人性解剖的深度。

5部中篇小说，5组典型人物形象。对于从事影视剧创作十余年后重新回归小说现场的陶纯而言，这种“讲故事”进而“讲好故事”的强大能力在小说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和好看故事带给读者的，除了阅读时的“惊艳或屏息”，还有对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记忆和致敬。

陶纯：置身于和平的环境中，时间久了，某些作家笔下的当下世界，越来越不疼不痒，越来越同质化，越来越无病呻吟。换言之，就是文学回避宏大叙事，钻入个人化叙述的迷宫里走不出来，对时代的概括性、思想性和思辨力都趋于弱化。在我看来，文学还是应该更多书写关乎时代、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小说描绘现实生活，还是要讲述精彩好看的故事，塑造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1869年完成的，他写的是1805年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战争进程。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五六十年前发生的事。英国作家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巨人的陨落》《世界的凛冬》《永恒的边缘》，以不同国家的几个家庭的经历，串联起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战争是其主要的内容。就我们国家而言，革命历史、战争历史是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虽然

前面有不少前辈作家挖掘过，但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挖下去，而且一定会有大作品在这个题材领域诞生。

这便是我近年来执着于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吧。我们这支军队是一脉相承的，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从未中断和割裂，因而写的虽然是“昨天”的故事，抒发的还是一样的感情，流出的眼泪还是一样的味道，心跳还是一样的律动。

也许由于性格温和的原因，我更擅长写战争中的女性人物。我倾注了大量的感情来书写战争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从短篇小说《小推车》中的支前女工小娥、中篇小说《秋莲》中的秋莲、《根》中的红军女战士张梅、《过来》中的外祖母李慧芬、《七姑八姨》中的4个女性——庞壮英、苏三妹、罗秀娥、何四姑，再到长篇小说《浪漫沧桑》中的余立贞、《芳香弥漫》中的苏艳秋……我固执地写着她们，并从中得到感情的慰藉、思想的发现。

这些故事和人物，有一些是有原型的，他们藏在汗牛充栋般的党史和军史的隙缝中，很容易被他人忽略、遗忘。这些都是在历史烟尘中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好比一坛老酒，藏了几十年，它的味道更醇厚。我当作宝贝一样发掘他们，是为了发掘有艺术价值的人物。

但是，仅有历史故事，是远远不够的。“信言不美”，这是老子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艺术是需要想象的，艺术是需要虚构的，你把生活中的东西照搬过来，它是不美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比如说口技，你模仿鸟叫是很好玩的，但你提个鸟笼子上台来让鸟自己叫唤，那就没艺术价值了。这里需要有个转换，把它变成艺术。

我总是提醒自己，写慢一点，再慢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感悟英雄，品味苦难，并且嗅到芬芳。我力求选一个新一点的角度，写得感人一点，写出一點新意。这个过程无疑是极其艰难的，但也正因为有难度，这种挑战对于军旅文学才更有意义。《七姑八姨》中的党史工作者“我”在小说的结尾处说：“我试图将埋没了的历史挖掘出来，吹去尘埃，擦亮它，让它闪光。”其实，这正是我自己的创作初衷，也是我想对读者说的话。

鸬”这个意象也代表了“树枝”自己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家庭发生变故后，她改名为“喜鸬”，这是她对自己余下生命的一种重新审视。

《有生》中的生育审美趋向于朴实与平淡，展现出一种生活化的文化美学。小说用温和的笔法和诗意的手法来描绘祖奶这个形象，继而展现人物形象背后的生育之美，展现生命延续的力量，展现生育的伟大。胡学文笔下的生育是神圣的。自然万物皆有生命，万物生不息，是以有生。胡学文用祖奶和与其相关的乡村小人物生命体验折射出百年中国的乡村生命秘史。祖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童年的漂泊与生活历练练就了她的胆量，接生的技能造就了她的魄力，这样的一个人物让更多的读者开始关注近代乡村的生育历史。小说最出彩的地方是对于生育美的一种超越，生育的艰难与生育的神圣并存，共同展现生命的本质力量。

祖奶的一生都在为别人接生，为了帮助别人她可以不顾路途的遥远，不顾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一生都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祖奶，却不断经历身边的人离去的痛苦。每一次的打击都让祖奶几近死亡，但是，每一次的接生都是乔大梅的再生，这让我们体会到了生育这个神圣的事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振奋，让我们体会到了绝望与希望共生的精神力量。胡学文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生育的历史，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倾向：让这些小人物呈现出一种壮美的人生状态，进而把个体与家庭、传统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相融合，传递给读者一种生的希望和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胡学文笔下的每一个小人物都代表了人生的不同空间。“树枝”对于父亲和弟弟的懦弱以及母亲的背叛感到失望，对于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她想要改变这一切。从喜鸬身上她看到了顽强，看到了和生活作斗争的勇气。其实“喜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杨留贝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比我小很多很多的年龄阶段，就已经亲眼看到了“红星杨”。而我初次听到“红星杨”，应该是在少年时期。

只记得当时一个影子飞到我身边，大口喘气：“知道不？树里藏着‘红五星’，与红军帽子上一模一样的‘红五星’呀！”我知道红军帽上红星闪闪的五星星。可是，树里藏着红五星，那是电影里的故事吧？

长大一些后，我终于知道，有一棵看上去很普通的杨树，树干里真的藏有神秘的“五角星”。这种树被称为“红星杨”，就生长在我的家乡太行山上——红色武乡。家乡曾经驻扎过八路军，家乡还生长出了“红星杨”？我在得知有这样一种“红星杨”后，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它，只是任它的种种故事像传说一样在耳边游走。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遇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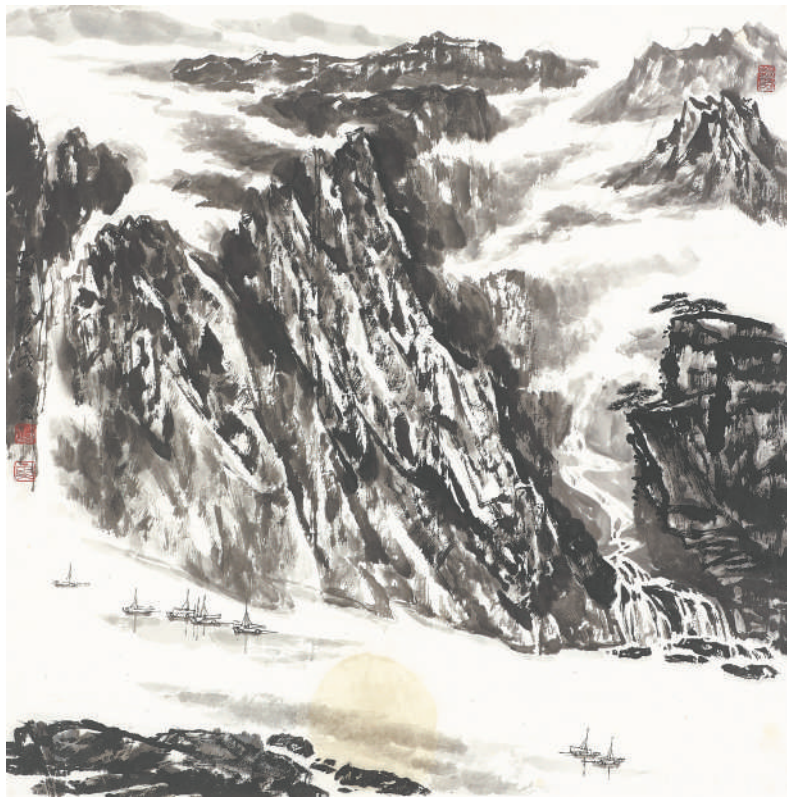
那一天，“咯嘣”一声，两截细细的枝条截断在我面前。这哪里是两截树枝呀，我看到的是，两枚清晰的五角星，那工整规范的形状，怎么可能是树里自然生出的？分明是一刀一刀镌刻进去的。顿时，内心一阵震撼——大自然中一定有一股力量，以人类无法看到的方式，神秘地存在着，鬼斧神工。

真正看到红星杨，并非在武乡，而是沁源；并非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而是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那一天，是我新出版的一本书《沁源1942》的首发日，2020年9月12日。沁源与武乡同属长治市，两地相距仅75公里。尽管这样，那个瞬间我还是有些恍惚。书写沁源的过程中，我关注的植物一直是抗战功勋油松，怎么会突然遇见我印象中武乡才有的红星杨？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缘分，红星杨恰恰生长在这样两个特别的地方。是冥冥之中的预兆吗？那一刻我内心思绪翻滚，也许那一刻，“少年杨留贝”就在我心里了。就在我还沉浸在这棵树是如何从武乡到沁源的纠结时，同时在场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陈彦玲已开始策划：让立在眼前的“红星杨”成为一本书中的主人公。站在那棵树下，看着树旁边的解说文字，萌发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小读者知道，“太行山上，有神奇的红星杨”。她觉得，这棵树不应该仅仅生长在郁郁葱葱的山间，更应生长在永恒持久的文字和小读者的心中。

“你写吧，好题材！”她在看树的同时，这样肯定地转向我。少儿小说？我行吗？犹豫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已经飞越长江，来到黄河岸边。这是来自长江边的诚意，他们决心要让红星杨翻过太行山，渡过黄河水。

而那时，我的头脑中只有一个较为模糊的构思。故事框架，来自于我多年来奔走采访搜集到的有关抗战的素材，更来自于徒步行走中听说的太行山中



蜀江帆影（中国画）
杨雨文作

一树挺拔

蒋殊

“红星杨”的传说。

红星杨，为什么值得保护？红星杨从哪里来？为何生长在太行山中的革命老区？“五角星”藏在普通杨树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山中少年有着怎样的愿望与坚守，要拼死保护红星杨？一连串的问题，思考与想象一再更新。一年多的时间里，想象与印证逐渐关联。一群少年、一片树林、一种力量，成为我脑中奔流的风光。又一段时间，杨留贝、杨林村、红星杨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进入2021年，创作的过程，一度很愉悦，也曾很艰难。小说终于在2021年3月底完成，使命感得到了释放。回过头看，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似乎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但很快，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了——《红星杨》入选2021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我知道，这是红星杨的力量。

后来，我在纸上细细画出杨林村，画出杨林沟，甚至村中每一条小路，也试着画出雪白雪白的白雪，以及一只喜鸬。语言、结构、情节、细节，故事走向、人物性格、命运流转，我跟着人物走，激动地看着大风任性吹，欢喜地跟着少年们肆意奔跑，忧伤地看一台大戏孤独唱，哭泣着看一场大火在杨林沟熊熊燃烧。半个月时间，我一口气完成了第三稿，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一稿。

我把书稿发给了责编。那是一个深夜，我的眼前却闪烁着一片葱茏的红星杨，一棵一棵，一树一树，奇妙地组合成一个五角星。完成书稿的我，不断反思。原本，我是试着去解读一种树，而此刻的我发觉，创作出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同时，也努力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感谢《沁源1942》，让我结缘红星杨。我的回馈，便是将《沁源1942》书中一篇文章——《奔跑的少年》中的人物李留贝转化为《红星杨》中的杨留贝。我的潜意识中，“留贝”不可或缺。李留贝，我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为《沁源1942》采集出版信息。当时，李留贝举着一把羊铲从刚刚收割完玉米的土地飞奔过来，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村庄是英雄村。远远地，那把羊铲像极了一支红缨枪。我问他：“如果战争来临，敢不敢去送信？”他没有犹豫，果断回答：“敢！”第二次，是《沁源1942》首发式，他闻讯而来。

两次的遇见，我相信这是一份“缘”。我脑海中的他，分明就是从前那个奔跑在太行山中、保护红星杨的英雄少年。他和他的同伴，一定与挺拔的红星杨一起，倔强地傲立在太行山上，身上都带着一束永恒的光。

动人的青春壮歌

张凡 史燕燕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孔立文的短篇小说集《天山不了情》（新疆人民出版社），收录了《等着我》《只有你》等7个短篇小说。这一系列小说以内地支援边疆为主题，叙写了第一代“军垦母亲”饱经沧桑的风雨人生，再现了以她们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西部拓荒者和边疆建设者，为保卫边疆、开发建设新疆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建设新疆、巩固边防的号召，一大批满腔热血的有志青年心怀信仰与理想西上天山，承担起为祖国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与时代担当。这其中，就有一群在荒野上挥洒热血与青春的年轻女性将自己的生命嵌入祖国边疆建设的历史中来，

她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军垦母亲”。小说《天山不了情》讲述了林芳菲、林芳华两姐妹满怀理想和革命热情从遥远的故乡来到千里戈壁滩，屯垦戍边的故事。开荒造田、拦河筑坝，干就是一辈子，林芳菲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女兵们在日记中记录着一首诗：“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和高粱。一阵号响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故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对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这或许便是那个时代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的军垦战士们生活与日常的真实写照。林芳菲和林芳华的生命足迹，穿越沙漠，攀上雪山；她们在茫茫戈壁上开荒造田，修渠引水，用勤劳的双手建起美丽的绿色家园；她们用爱、用坚强、用青春、用热血融化了天山南北的千年冰雪，哺育着干涸已久的荒漠戈壁，开辟了欣欣向荣的片片绿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是屯垦戍边的巾帼英雄，是为祖国边疆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代楷模。

作家孔立文基于真实而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等着我》《只有你》等小说中，叙写艰苦卓绝的屯垦生活和戍边故事。小说《等着我》以唐素英和武靖轩的爱情为叙述线索，描写了唐素英和武靖轩生死相许的感人故事。唐素英将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兵团，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演绎着平凡而真实的奋斗人生。因为有了爱情和守候，屯垦戍边避免了“一代而终”的难题；因为有了爱情和守候，边疆的发展稳定有了根本保障；因为有了爱情和守候，兵团的各项建设事业薪火相传，充满生机和希望。

孔立文以精心细致的构思、饱含深情的文字书写了一代屯垦战士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字里行间彰显着催人奋进的兵团精神。小说着力塑造的“军垦母亲”形象并不是个例，而是扎根在兵团成千上万“军垦母亲”形象的缩影。她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演绎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唱响了一曲曲建设祖国边疆、巩固西北边防的青春之歌。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生命的精神延续

陶娜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成熟的写作笔法、精巧的故事框架，把乔大梅即祖奶传奇的一生描述了出来：通过生命延续的意象寄托和生育审美的变化，展现“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小说中有乡村巨变的史，也有生命延续的历史，还有乡村小人物的情感历史。

《有生》展现了人物对生命的敬畏与怀念，表达了作家对生命延续的思考和生命存在方式的重新阐释。这种生命延续的意象寄托，是向善与纯洁的精神力量，在不同人物身上有不同表现，抚慰着人们的心灵创伤，给人们带去生的希望。

胡学文笔下每一个小人物都代表了人生的不同空间。“树枝”对于父亲和弟弟的懦弱以及母亲的背叛感到失望，对于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她想要改变这一切。从喜鸬身上她看到了顽强，看到了和生活作斗争的勇气。其实“喜